

烽火弦歌：浙大龙泉分校里的六位瑞安先生

■林良爽



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旧址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为保存文明火种，众多高校踏上西迁征途，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浙江大学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文军长征”，最终扎根贵州遵义、湄潭等地。为解东南诸省学子失学之困，1939年，教育部准予浙大于丽水龙泉创办分校——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所战火中诞生的学府里，竟汇聚了六位来自瑞安的杰出学人：苏毓棻、孙正容、张崧、陈光汉、陈楚淮、李笠。他们在龙泉的青山绿水间传道授业，不仅为抗战教育贡献力量，更书写了瑞安学人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又一璀璨的篇章。

苏毓棻：筚路蓝缕的奠基者

苏毓棻（1886—1941），字叔岳，瑞安城关人，是六人中最早到浙大的。1940年11月，苏毓棻被调至浙大龙泉分校，担任训导主任兼“先修班”主任及历史教师，主讲中国通史。他还担任分校公费免费贷金委员会、刊物委员会委员。

抗战时期创设的大学“先修班”属新生事物。作为训导主任和班主任，苏毓棻善于做学生思想工作，常通过座谈会、茶话会等了解学生情况、征求意见、讲解形势，与学生打成一片。当时温州籍学生较多，他曾专门宴请他们。

关于其卒年，《张桐日记》民国三十年八月廿一条载：“昨闻人说，瑞安苏来卿之三子叔岳在家病殇。叔岳就浙大讲席，将近十年，成绩极好，近因暑假归休息，忽遭此厄，伤已！”此记载明确了苏毓棻于1941年8月暑期病逝于家乡。

孙正容：明史专家



孙正容（1908—1985），原名庆加，字端宸，飞云孙桥人。因敬仰乡贤孙诒让（字仲容），改名“正容”，寓继承先贤之志。1926年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直接考入中央大学史学系。

1938年杭州沦陷后，时任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教师的他，随杭高迁至丽水碧湖，在抗战最艰苦时期率师生辗转于崇

山峻岭间，为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1940年2月，孙正容到浙大龙泉分校任历史讲师，担任文学院、理学院的《中国通史》课程教学。据龙泉分校校史记载，他曾参加分校第七、八次校务会议，还担任过分校编辑委员会委员。

孙正容是著名史学家，专注明史研究，发表《略论朱元璋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等大量论文，著有《高中本国史》《朱元璋系年要录》等。

张崧：学者型教师

张崧（1907—1965），原名毓崧，字慕骞，汀田人。1931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全面抗战爆发后，任教于迁徙至青田的温州中学。1940年8月，他应聘至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担任历史讲师、副教授，任教《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

1944年，张崧向分校提交“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师范学院添设史地学系计划书”，得到分校领导的高度重视，1945年6月6日，教育部同意分校师范学院添设了“史地学”等系。

其父张桐在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如民国三十年七月廿九日载：“崧儿忽自水南中校回，云龙泉大学校长郑宗海打电，聘崧儿任教史地讲席，并托王季思介绍，崧已允赴之……”

张崧国学根基深厚，精于目录版本学。学生回忆：“历史老师张慕骞常常是一支粉笔进课堂，把一部二十四史讲得头头是道。鲜活的故事从他嘴里汩汩地冒出来，比说书先生还讲得神、讲得深。”

他与夏承焘、陈雁迅、孙孟晋等交好。1942年11月，他曾陪同夏承焘自

温州赴龙泉分校报到。1965年张崧去世，夏承焘挽联云：“风雨龙吟楼，旧梦如画，同语者几人；明季南北略，绝学未竟，是后学之责。”足见情谊之深。

陈光汉：才情与悲情



陈光汉（1912—1955），字雁迅，塘下镇人。少年从邑儒余思勉、戴炳璜学诗文，后入温州中学，为夏承焘、王季思弟子。高中毕业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从国学大师唐文治等。

1943年1月，陈雁迅受聘至浙大龙泉分校任文学院助教。其间曾短暂赴台任职。抗战胜利后，1947年6月，他进入浙江通志馆，任馆员、采辑课课长。1949年通志馆解散后，9月供职浙江省图书馆，任研究员，从事图书校勘。著有《慈竹平安馆诗稿》《瑞安孙先生传记》等。

不幸的是，1955年在“反胡风”“肃反”运动中，陈雁迅于8月20日在杭州西泠桥附近自杀身亡，年仅43岁，正值学术盛年。

陈楚淮：戏剧家、教育家



陈楚淮（1908—1997），字江左，笔名阿淮等，林垞人，戏剧家、教育家。1924年至1928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外文系，攻读英美文学，师从闻一多，与

同邑王季思同学。大学期间即热爱戏剧创作，组织香港文社、樱花剧社等，并排演话剧。

1930年，他出版第一本剧本集《金丝笼》，成为新月派戏剧代表及我国早期象征性戏剧奠基人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离沪返温，先后任教于温州中学等校。烽火燃起爱国热情，1939年2月起，他连续在《战时中学生》发表《铁罗汉》《周天节》《血泪地狱》等抗战剧作。

1940年8月，应龙泉分校主任郑晓沧（宗海）之邀，陈楚淮赴龙泉分校任副教授，教授英文。同年11月，与苏毓棻同时被聘为分校刊物委员会委员。学生日记中多次记载其风采：师生联欢会上讲笑话“博得满座哄堂大笑”；讲“抗战文学”“甚博听众欢心”。与苏毓棻共同宴请温州籍学生，“各以家乡语言相谈，酒席间，笑语频传，极一时之乐。”足见其受学生欢迎。

李笠：自学成才的教授



李笠（1894—1962），原名作孚，字雁晴、岳岳，瑞安城关人。生于贫苦家庭，九岁始入小学。后赖亲戚资助就读瑞安县立中学，无力购书则手自抄录。1914年毕业后任家庭教师，坚持自学，终以深厚学养登上大学讲坛，成为著名教授。

抗战时期，中山大学屡经迁徙。李笠随校颠沛流离，共历患难。1942年，

中山大学迁粤北坪石，中文系师生联名邀其返校。坪石沦陷中大解散后，他历尽艰辛，于交通阻塞、烽火遍地中返回故乡瑞安。约1944年，他曾在瑞安中学短暂兼任语文教师。

1945年4月，李笠到浙大龙泉分校任文学院教授，是六人中最晚到该分校任教的，但其在时间不长。同年，中山大学在广州复课，他便重返中大。

李笠终生从事教育，桃李满天下。治学广博，著述宏富，于文字训诂、目录学、经史诸子校勘皆有涉猎，尤以校勘学成就最高。著有《史记订补》《中国目录学纲要》《校勘学》等。

烽火连天，弦歌不辍。苏毓棻、孙正容、张崧、陈光汉、陈楚淮、李笠这六位瑞安籍学人，在浙大龙泉分校这方特殊的学术阵地上，以其深厚的学养、严谨的治学和不懈的育人精神，为维系民族文脉、培养战时人才倾注了满腔热忱。龙泉分校虽已湮没于历史烟云，但瑞安学人于国家危难之际，在浙南深山播撒知识火种、坚守文化使命的身影，将永远铭刻于浙江大学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史册之中。他们的故事，是“文军长征”精神的生动注脚，更是瑞安学人风骨与荣光的不可见证。



扫一扫，看电子版

一位参与日本战犯审判的瑞安人

——于平



1946年，广州军事法庭。一位瑞安籍法学家，被法庭指定为恶贯满盈的日本战犯、前香港总督田中久一辩护。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审判中，他的角色特殊而关键：不是为战犯开脱，而是要以专业的法律素养，确保审判的程序公正，让正义以无可指摘的方式得到伸张。

这位瑞安人，叫薛祀光。

特殊法庭上的瑞安身影

这场审判的背景要追溯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胜利。战争胜利了，但对正义的追求才刚刚开始。根据同盟国在战时形成的共识，国民政府于1945年11月6日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在全国设立十大军事法庭。广州军事法庭于1946年2月15日设立，拘捕日本战犯951人，拘押人数在十个军事法庭中最多。

广州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按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海陆空军刑法等法案决定是否起诉。1946年5月23日，法庭对战犯田中久一提起诉讼。田中久一为日本陆军第22军军长，兼南支派遣军司令，1944年2月起兼任香港总督，指挥日军在中国焚烧劫杀，无恶不作。

审判允许机关、团体、地方人民推派代表到庭陈述意见。被告战犯可聘请律师辩护，没有聘请的则由法庭指定律师。精通国际法的薛祀光被指定为田中久一辩护。在这一特殊岗位上，薛祀光强调“纵兵殃民”罪的主观故意认定，始终坚守司法程序公正的原则，以专业的法律素养履行职责，以法理守护正义。

1946年10月17日，法庭以纵兵屠杀非战斗人员、强暴劫掠流放平民等12项罪名，判决田中久一死刑。次年3月27日，田中久一在广州被执行枪决。尽管面对的是恶贯满盈的战犯，中国仍然依照国际司法惯例给予公正审判，在法律框架内完成审判，彰显了审判的程序正义以及对战犯的人权保障。

从瑞安走出的法学巨擘

薛祀光，字声远，著名法学家、教育家，1900年生，上望薛里人。其父薛一清（1874—1951），清庠生，毕业于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律师，以持论公平饮誉东瓯。曾参与河乡宾兴管理、聚星书院改学堂、议改师范传习所等事宜以及代表聚星学堂到瑞中捐款等。

薛祀光天资聪颖，幼承庭训，勤奋好学。少时就读于聚星书院（今莘塍中心小学）。1913年8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与同学郑振铎、夏承焘等为该校一时之秀。1918年8月，曾回母校聚星书院担任教员，时间一年有余。

1919年12月，薛祀光凭借优异的表现，获得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进入九



州帝国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28年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留日期间，他系统研读了现代西方法律体系，尤其在民法领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同时也深刻体会到法律制度对于国家治理与社会公平的重要性。

1928年归国后，薛祀光受聘于中山大学法律系，从此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法学教育生涯。1931年9月，中山大学法科改称法学院，薛祀光任首任院长。当时广东的法学界，包括许多法官和律师，皆出自其门下。薛祀光领导下的中山大学法学院，为地方法治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与重要力量。由于在中山大学的教授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薛祀光故被推选为教授会会长。

危难时刻的知识分子风骨

薛祀光一生坚持正义，不畏强权。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义愤填膺，掀起争取北上抗日运动。时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薛祀光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联合24名教授及部门负责人发起募捐援助活动，积极支援前线，反对校方肆意开除学生，并参加“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中大反日会”，公开呼吁政府增援十九路军，以实际行动践行抗日救国的信念。

1947年，中山大学学生参与“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当局逮捕了28名地下共产党员和师生。薛祀光利用其法律界的声望和中山大学教授会会长的名义，迫使当局释放进步人士，为此得罪了相关人士，被列入黑名单。薛祀光于是毅然离开了任教二十年的中山大学，被誉为“中山大学人文社科发展历史上不可忘记的重要一人”。

随后，他被上海暨南大学聘为法律系教授。翌年转聘为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同年9月出任法学院代理院长，12月正式担任院长。此后，他仍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多次营救被迫害的

师生，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用知识分子的方式守护着民族的尊严。

毕生耕耘法学教育与研究

薛祀光一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专长国际法和民法，在教育界、法律界享有盛誉。1929年9月，从日本归国才一年的薛祀光就发表了题为《中国法系的特征及其将来》的文章，系统研究了中国法系的生命力问题。他主张通过弘扬传统法文化的优点与长处，复兴中华法系，以增强民族自信心。

新中国成立前，薛祀光为教育部部聘教授，这是当时最高的荣誉职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任教，继续为中国法学教育贡献力量。在民法学课程讲授中，他注重基础理论，结合社会现实，引导学生思考法律如何保障民生、维护公平，这种教学理念深深影响了一代法学学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北大学被撤销解散，薛祀光离开了执教近40年的高校，湖北大学民商法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由此遭受严重影响。晚年，薛祀光返乡定居，于1987年去世。

薛祀光毕生致力于法律研究和实践，论著丰富，著有《法律丛书》《管子六法》《民法概论》等。其中《民法债编各论》一书，曾于1943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评选的第三届学术奖励作品三等奖，为全部6届评选中仅有的5部获奖法学著述之一，成为近代法学基础性著作。他由于在民法债权方面研究深入，颇有造诣，被业界尊称为“薛老债”。

2018年，薛祀光被列为“百年温州的九大著名法学家”之一。这位从瑞安走出去的法学巨擘，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坚定的法治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在中国近代法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